

DAOGUANG SHIQI GUANGZHOU
SHEH

道光时期 社会治安研究

江 波 ©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JIANG SHIQI GUANGZHOU
SHEHUI ZHIAN YANJIU

道光时期 社会治安研究

江 波◎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光时期广州社会治安研究/江波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306 - 05319 - 0

I. ①道… II. ①江… III. ①社会治安—研究—广州市—清代
IV. ①K296.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334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吕肖剑

特约编辑: 章 伟

责任编辑: 王延红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易建鹏 陈俊婵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50mm × 1168mm 1/16 17.625 印张 31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8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道光时期广州社会治安研究》是笔者在2011年12月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暨南大学刘正刚先生的鼓励。博士毕业三年多来，我继续对博士论文的论题进行探索，积累了清道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关广州社会治安的几十万字的素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这本小书。

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转折意义，在这场中西方制度、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较量中，道光年间的广州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书主要通过档案、文集等资料，描述性地勾勒道光年间广州城的社会治安问题，从一个侧面管窥传统社会对危机事件的应急措施及其效果。

本书以道光年间广州社会治安为研究对象，将治安管理纳入中外贸易、鸦片战争及社会变迁等宏大场景中进行梳理和叙述。全书以1840年为界分成鸦片战争前夕、鸦片战争期间及鸦片战争后三个阶段。第一部分主要探讨鸦片战争前夕，广州的社会治安在中西方贸易体系下的一些变化，试图通过典型案例，考察广州各级地方政府在这场贸易之争中的应对策略。广州各级政府竭力维护原有的贸易体制，从而表现出来的蒙昧和妥协，对理解广州近代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不惜笔墨给予足够的讨论。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战争期间，为了应对英国在军事上的挑战，广州各级地方政府对社会治安无力控制，特别是杨芳、奕山主政广东时，湘兵对广州市民的侵扰及军队内讧，导致战时广州城一度陷入失控的局面。第三部分主要考察鸦片战争后条约背景下的广州社会治安。战后的广州，商业严重凋敝，徐广缙沿用传统的治安模式，总体上稳定了广州的社会治安秩序。

从近代化的角度看，不论是在中西贸易体制下、鸦片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的条约背景之时，广州各级地方政府在治安模式和管理意识形态上，尽管在某些方面迫于列强的压力而做了一些应对式的调整，但并没有形成新的治安管理机制。总体来看，仍是一如既往地维护原有的治安体系，这种滞后的治安模式在当时的中国绝非特例。实际上，广州的社会治安可以说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并未因时局的变化而适时做政策性、制度化的调整，从而影响了广州近代化的进程。

作者自知浅薄，书中堆积了大量有关道光时期广州社会治安方面的

史料，并不全面，又明显地感觉到史料有余，史评不足。但为了推动道光时期、鸦片战争及广州城市史的深入研究，希望这本不成熟的小书能为未来更有水平的学者、专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点肥料，因而不顾这本小书的粗浅，大胆地将它刊印出来，以求教于有识之士和广大读者。

此外，从来到这个世界，我就受到无数人的关怀，这本小书虽然质量不高，但我还是想将它送给所有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人，权作覆瓿之用，毕竟它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完成的。

献给亲我的和我亲的 献给爱我的和我爱的

江 波
2014 年 12 月

目 录

导论	(1)
一、道光时期的广州政区和城区	(1)
二、古代治安管理的概念和内涵	(12)
三、相关学术史回顾	(15)
四、研究思路及资料来源	(26)

上编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的治安重心

第一章 嘉道时期广州城的管理布局	(35)
一、广州城官僚体系和基层社会组织的构成	(35)
二、内外城的安全防务	(39)
三、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治安制度	(43)
四、广州地方政府“严打”的恶性治安案例	(54)
第二章 针对行商和外国商馆的商业管理机制	(59)
一、行商及政府的严控	(59)
二、对外国商人及其商馆的管理	(65)
第三章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纠纷	(75)
一、华夷伤害案的处理	(76)
二、中外贸易制度对抗下的纠纷处理	(82)
三、特殊案件的处理	(96)
第四章 严禁鸦片走私的治安举措	(103)
一、打击鸦片走私, 扼制纹银外流	(104)
二、严厉惩治参与走私、涉及鸦片和私易纹银的腐败、渎职官员	(121)
三、对各类“汉奸”的处置	(126)
四、综合治理以求根绝之效	(130)

五、配合打击鸦片走私行为的其他社会治安整治	(140)
-----------------------------	-------

中编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社会治安的无序状态

第五章 广州城内外的军事布防	(146)
一、林则徐的军事布防	(146)
二、琦善主政广州时的社会治安	(149)
三、杨芳、奕山的军事防控	(156)
第六章 广州社会秩序的混乱	(163)
一、驻兵的袭扰引发社会动荡	(163)
二、奕山主政期间社会治安失控	(165)
三、赎城后的广州城及官府的社会维稳措施	(169)
第七章 广州官绅在战时社会治安中的作用	(173)
一、士绅倡导并组织备战力量	(174)
二、行商在战时的摇摆态度	(178)
第八章 民众的武装反抗与官府的化解	(182)
一、民众的抗英激情	(182)
二、三元里人民抗英	(184)
三、举人何玉成的抗英行动	(186)
四、官府对民众武装力量的化解	(188)

下编 鸦片战争后广州社会治安的调整

第九章 广州民众反英军入城	(197)
一、官府对英国人入城的态度	(197)
二、官民之间的冲突与刘浚事件	(200)
三、士绅支持民众反入城行动	(204)
四、官府对民众反入城行动态度暧昧	(208)
第十章 战后广州处理中外关系的取向	(215)
一、广州对外国人治安处罚权的丧失	(215)
二、华夷纠纷案的处理	(217)
第十一章 军事建设与商业调控	(227)
一、军事和城市建设保广州安全	(227)
二、商业调控化解民生困境	(231)

三、官府的维稳措施	(233)
第十二章 处理“夷务”为中心的广州城	(235)
一、条约实施背景下的广州社会	(235)
二、梳理夷务，确保广州社会稳定	(236)
结 语	(241)
参考文献	(244)
附 录	(254)
(一) 道光年间广州治安大事记	(254)
(二) 人名索引	(255)
(三) 道光年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及任期表	(256)
(四) 道光年间广州知府、广州将军任期表	(257)
(五) 道光年间粤海关监督及任期表	(258)
(六) 博士论文后记	(259)
后 记	(262)

导 论

一、道光时期的广州政区和城区

1. 明清时期的政区、城区

明朝洪武二年四月（1369年5月），朱元璋改元代的广东道为广东行中书省，广州成为行中书省的省城。诏令广州府领辖一个州十五个县，省城城区分成两个部分，由省城附郭南海和番禺两县管辖，两县的县衙皆设于广州府治所在地。到了清代，依然设置广州府，诏领十四个县：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清远、新安及花县，南海、番禺两县仍属广州府城的附郭，共同管辖广州城。^①

明代广州城的建设规模比较大，是继南越国、北宋后的第三次扩建，起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当时的指挥使胡通修葺广州城旧垒。^②洪武十二年（1379年），永嘉侯朱亮祖，都指挥使许良、吕源认为旧城非常低矮狭隘，上疏请求重修，得到批准。此次重修将东城、西城和子城连为一体，并开辟城区东北面的山麓，扩充成为城区。城东西之外有护城河围绕，正北门外筑有瓮城庇护，在东门的北城下设置小水关，并以石柱防护小水关，以疏导城内渠沟之水，目的是防止雨季水浸内街现象的发生。城的北面有越秀山，山上靠左面建筑了五层高的镇海楼，更多的是从城市风水的角度出发，借助神灵保卫广州城的安全。登到该楼的楼顶可以看到当时广州城的全景。北城的外面还建有粤王台。^③

1556年，葡萄牙人克路士对当时的广州外城有非常具体的描述：“郊区很大，人口众多……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他的职责是每晚锁门，玩忽职守要严惩，每

①（清）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六，光绪五年刊本。

②（明）戴璟修，张岳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四，嘉靖十四年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

③（清）王永瑞纂修：《新修广州府志》卷十二，清康熙抄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据郭棐等纂修《广东通志》卷十五记载：“发军民三万人拓广东北城凡八百余丈”“城东西之外，因旧浚池，周二千三百五十六丈五尺”。

条街都有一名警察和一所牢房……因此每晚街上都有守卫。相邻的人则划分为区，每晚组成六个区，也就是值夜”^①。为进一步保证外城的安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总督都御史吴桂芳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一线开始建设外城，主要是为了提高城区防御能力，外城建成后共设有八个城门，东面永安门，西面太平门，南面永清门，东南面小南门，西南面有五羊（清朝改为五仙门）、靖海、油栏、竹栏四个门。^②

顺治四年（1647年），因珠江北岸沙洲不断与河岸联结在一起^③，总督佟养甲向南修筑了东西两个翼城，各长二十余丈，直至河（珠江）旁，因形似两鸡翼，故名“鸡翼城”。高二丈，厚一丈五尺，各有一个城门，东南面叫正东门，西南面称安澜门，正东门又称“便门”，通湛塘街及万福里，安澜门通安澜街。^④附近的街道和珠江面上都非常繁华，当时有人写诗描述其繁华程度：“潮来濠畔接江波，鱼藻门（安澜门）边净绮罗。两岸画栏红照水，登船争唱木鱼歌。”^⑤可见当时的省河（珠江）已经有了大量的胥户（即船户）活动。

比较大型的城门、城墙修葺活动在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都有过。

至嘉道时期，广州城主要位于越秀山和珠江之间，东西以濠水为界，基本因袭明代规模，翼城是在商业繁荣、人口大增的情况下增建的。广州城分为内外两城已成为定式，所谓内城就是明代永嘉侯朱亮祖所建的东城、西城和子城三城合一的城区，当时称为旧城，方圆约二十里又三十二步，有七个城门。外城包括明代吴桂芳所建的新城和顺治四年总督佟养甲所筑的东西两个翼城，道光时有所增修，称为东西临海二城。大约外城就是惠爱街以南到珠江这个范围。此后直至清末，广州城没有再行扩建，基本维持嘉道年间的规模。

广州内外二城虽驻有广东省各级衙门，但并无一个固定的部门来对广州城进行日常的治安管理，内外城由南海和番禺二县分而治之。南海县分治广

① [英] C. R. 博克舍编著：《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第二编，克路士：《中国志》第六章，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外国人笔下的“警察”其实是中国官府的衙役。

②（清）李义壮：《广州新筑子城记》，见《广州府志》卷六十四，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二。

③ 据曾昭璇估算，自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至清顺治四年（1647年）间，珠江江岸淤出滩地达20多丈，平均每年淤出约1米。（参见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④（清）阮元修，陈昌齐等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二五，引《南海县志》。

⑤（清）王士禛：《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8页。

州城的西境，以内城的正北、正西、归德和外城的太平、竹栏、油栏、靖海、五仙八个门为管辖范围；番禺县分治东境，以内城的正东、小北、正南、文明、定海和新城的永安、小南、永清八个门为其管辖范围^①。这是嘉庆末年两广总督阮元亲自挂名纂修的《广东通志》描述的广州城情况，应该说基本上代表了道光时期的广州城格局。

2. 广州城内水路的建设

广州城处于珠江口，城区内有很多河涌注入珠江，城内河汉纵横，水路众多。而珠江水系特别是珠江河道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很大变化，由于西、北两江水流量急剧减少，珠江泥沙淤积日趋严重，沙洲与河岸联结速度加快，流经广州城的珠江江面逐渐缩小^②。水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广州城区特别是外城的发展规模，珠江水系建设与广州城以水为中心的社会治安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明清两代广州各级衙门都非常重视濠涌的整治和疏浚，把它们与广州城区内涌外河的商贸通道建设、发挥卫戍作用的护城河建设结合在一起统筹考虑，使纵横于城区中的河汉基本上能够安然度过每年的雨季和汛期，确保城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到明朝时期，广州城有南濠、清水濠（即古东濠）、东濠、西濠和广州城内古渠等。^③广州古渠即六脉渠，在内城，历朝历代都不断对“六脉”进行疏浚，使它们互为贯通，并与清水，东、西、南各濠相联结，而各濠则与珠江相通，确保广州城内没有水患。^④乾嘉年间顺德人仇巨川对六脉渠予以详细的记录：

所谓“六脉渠”者，一、草行头至大市，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二、净慧寺街至观堂巷、擢甲里、新店街、合同场、番塔街，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三、光孝寺街至诗书街，通仁王寺前大古渠，水出南濠。四、大均市至盐仓街，及小市至盐步门，通大古渠。五、按察司至清风桥，水出桥下。六、子城城内出府学前泮池。六脉通而城中无水患，盖城渠之水达于闸，闸之水达于濠，濠之水入于海，此城内水利所由通也。^⑤

①（清）阮元修，陈昌齐等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二五。

② 参见邱丽：《明清广州珠江河道变迁与城市街巷空间的发展》，载《华中建筑》2009年第1期。

③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四。

④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二五。

⑤（清）仇巨川撰，陈宪猷校注：《羊城古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如前所述,广州东城、西城和子城合为一体是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建护城河,已经开挖疏浚的濠周长有二千三百五十六丈五尺。其时,南、东、西及清水各濠都是连在一起的,“旧为濠四,皆达于海,今合为一”^①,围绕在广州城周围。只有城的北面因为有越秀山而没有开挖濠沟。成化三年(1467年),提督军务左副都御史韩雍和巡抚右副都御史陈濂商议在城北的山上开凿北城濠,可能是想将三面的濠沟(护城河)连结起来,以达到护卫城墙进而卫戍城区的传统目的。但是,正好到广州城巡察的太监陈瑄认为,广州府的地脉发迹地就在越秀山,如果开挖一条濠涌,势必将地脉截断,反而会破坏风水,影响广州城的安全。^②这一计划再也没有被提起过,因而在广州的众多濠水中没有北濠之说。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风水学所推崇的神秘力量对古代城市建设及其治安管理的影响。

清代加大了对各城濠的疏浚力度,在康熙年间就将明代设置在东门入海(珠江)口处的闸口打开,使内外城濠贯通,濠涌的宽度和深度甚至足以通行舟楫,但为保证卫戍的目的,在各个重要的城濠隘口构建炮台。^③那些跨越河涌、水濠的水关或闸口,往往在旱季和夜里都是关闭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水盗或海盗顺河涌进入城区,危害公共安全,^④应该算是广州城区特有的社会治安防御设施。濠涌既成为防御外敌、海盗、匪徒入侵的一道道屏障,也为水上交通提供极大的便利,从而保证了城区的社会治安稳定,推动城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3. 城区的街道和主要功能布局

(1) 街道的分布

清代中期以后至道光年间,广州内城街道设置基本奠定了今天广州街道的大致格局。根据同治《番禺县志》记载,全城属于番禺县管辖的街道有48条,主要有惠爱大街、仓边街、豪贤街、小北大街、德政街、府学街等。据同治《南海县志》记载,属该县管辖的街道有44条,主要有西门大街、惠爱街、光孝街、四牌楼、大南门直街、大北门直街等。

广州外城区包括新城和翼城,据同治《番禺县志》、《南海县志》记载,共有55条街道,其中番禺管辖文明门大街、高第街、定安直街、大南门直街等24条街。南海县管辖大新街、卖麻街、九曲巷等31条街。

① 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四。

② (清)郝玉麟修,鲁曾煜纂:雍正《广东通志》卷十四。

③ ④《广州府志》卷六十四;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二五。

(2) 城区功能布局

广州的主要军政机关和文化机构大部分设置在广州的内城和新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撤藩后,文武各衙门奉旨全部迁进旧城。从归德门一直到大北门,东边建设院、司、道、府、厅、县各署,西边建设驻镇将军、都统、武职等衙门。

两广总督署及行台(明景泰三年始设两广总督,驻梧州;嘉靖四十三年迁肇庆;1746年总督策楞奏请移驻广州,此后总督府一直设于广州)^①,先后在新城靖海门内、卖麻街,后移至内城。巡抚署在西门大街。提督学院署在内城九曜坊即南汉南宫旧址(小北路)。其他如布政使司署(惠爱大街)、按察使司署(在提督学院西)、盐运使司署(内城惠福巷)、督粮分巡道署(在按察司后街)、督标中军中营副将署(外城白米巷)、将军署(内城正烈坊,统率满汉旗军,满、汉旗营主要驻在内城西南角,以光塔街为界,汉军属驻街北地区,至惠爱直街附近,满洲属驻街南地区,至内城南城墙^②)、知府署(布政司署西,司狱司及监狱在仁和里,即今天的仓边路东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粤海关署(外城五仙门内)、河泊所大使署(内城仓边街宝广钱局之左)、平巢惠济东西二仓(西湖街)、大有仓(潮观街)、永丰仓(外城素波巷)、正南仓中南仓(天字码头)、公监(榨粉街)、府监(仓边街)、盐务会馆(清水濠)、盐务公所(高第街)、番禺知县署(正东门外惠爱街九约)、南海知县署(马鞍街)等,以上各衙、署、仓都设在城内。^③

学宫书院社学、祠庙等则有的设于城内,有的设于城外。万寿宫设在文明门外,是广州城内非常重要的建筑,也是广州最重要、规模较大的祠坛之一,充分体现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每遇万寿圣节、千秋圣节及元旦、冬至等令节,文武官员至此望阙行礼。每月逢朔、望两日,各级文武官员也要来到万寿宫,在向君王表达敬意后,退至讲所与军民人等一起环列肃穆,恭听司讲生宣讲圣谕,如有钦颁律例也在此宣讲^④。除万寿宫外,广州内外城还设有83座祭坛、祠堂、庙宇,80座寺、庵、观(著名的有大佛寺、能仁寺等),52所学校、书院、义学、社学和诗社。^⑤

演武厅在东教场,演炮所在东城外十里燕塘地方。其他如育婴堂(小

① 同治《番禺县志》卷十五。

② 参见《粤东省城图》,原图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③ 《广州府志》卷六十五。

④ 《羊城古钞》卷三;李福泰修,史澄等纂:同治《番禺县志》卷十五。

⑤ 《羊城古钞》卷三。

东门外子来里，城西第十甫）、普济堂（东门外教场东）、普济院（东门外黄华寺址）、恤嫠公局（文明门外三大忠祠）、麻风院、瞽目院（在东门外）、漏泽园（大小北门外）以及各类义冢都在城外^①。

到了清代，随着商业的不断繁荣，海上运输越来越发达，广州城区南部基本形成了一个商业带，粤海关也设在了城外珠江边。这与古代城市中的市场在北面（属阴性的布局）南辕北辙，体现了南方人重视商业、重视世俗需求的传统实用主义城市建设观念。这种实用主义还体现在广州城北有越秀山，山上有镇海楼；南有珠水，而水是有流动性的，远离水本身就表明对安全的要求。因此，广州城重地趋于北部，背山临水，实现了建城者实用主义的社会治安安全理念。当然这其中也反映了作为都城的政治中心城市与非都城的地方城市建设标准要求的差异。广州自古以来海运发达，是著名的古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由此沿海北上，可达中国大陆海岸诸港口；而南下可通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港口，海上航线十分遥远。由于“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②可见海路交通发达是广州兴起和发展成为岭南最早的经济都会的重要原因。从历代广州城的规划和建设看，其以商业或者经济为中心的特点也渐次显著。

因此，广州城的商业区主要集中在沿珠江一带的新城区。清中后期，广州发展最快的要数西关平原，即由西濠到小北江之间的低洼地得到了开发。清代西关最早的商业区为十八甫，即沿西濠和大观河兴起的原明代商业街圩。也就是从西城墙外的西北角起，沿西墙外向南一直到达西南角，再折向西南到达今天大观河边，呈东北—西南走向，伸延数里。因为西关集中了广州织造业的机房区，很多街道以织造为名，如锦华大街、经纶大街、麻纱巷等。其分布区主要在第六、七、八甫和上九甫一带，即位于城外西南地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富商大贾在西关开辟了高级住宅区，即宝华路、宝源路住宅区，位于泮湖东南一带，这一带的街道经过规划，均为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犹如棋盘，十分整齐。在城西南的西濠口以北，形成了官办洋商的特殊区域，即十三行，十三行街就是洋行兴起后开辟的新街，大都呈南北走向，直达珠江沿岸，显然是为了对外贸易，方便货物的水路运输。其中怡和大街、同文街、同兴街、靖远街等路名仍保留至今。在清代，若是商业城市

① 《广州府志》卷六十五；同治《番禺县志》卷十五，郑梦玉等修，梁绍猷等纂；同治《南海县志》卷四；《羊城古钞》卷三。

②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有外人聚居者，则经常划区以限之，广州是清代重要的商业城市，广州城外西关十三行就是给西洋商人居住的地方，洋人不得进入广州内城^①。

西关平原南侧有一个沙面区域，为珠江岸边的河滩地，就是今天白天鹅宾馆一带的老使馆区，由于水路交通方便，也成为广州最繁华的外籍人员居住区域之一。后来的英、法租界也设在沙面，英国在西面，法国在东面，有东西大街三条，南北小街五条（参见《粤东省城图》）。

法国人伊凡在 19 世纪 40 年代来到中国时这样描述划给夷人居住的街道：

……包含三条完全中式的街道。一条为了纪念水手们，欧洲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猪巷，中文叫新荳栏。它位于英国馆与美国馆东部之间的废墟上。尽管你现在看不到那里肮脏的动物了，此街即按照那些动物的名字命名，的确恰如其分。这是一种低档的酒馆，中国人会邀请水手进来，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他们掺假的低劣酒。这些黑暗巷子的众多店铺，在任何时候都在上演着酒醉之后令人厌恶的骚乱事件。另外两条中国街道也经常有人光顾：一条被称为旧中国街，中文称之为靖远街，位于法国馆与从属于美国馆的一块空地之间；另一条街叫新中国街，或称同文街，是法国馆建立之后才有的，先于丹麦馆。^②

可见，使馆区的社会治安是相当混乱的，广州地方政府显然忽略了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治理。接着伊凡继续描述靖远街和同文街的情况：

旧中国街和新中国街真的成了欧洲人的“侨寓地”，从没有一个中国人冒险进去，即便是他想进去购买商品时也不会这样。一个本土人不会去也不会被商人带到那里，而巴黎人会去参观某些本省人或外国人将冲进去的某些商店。事实上，逛商馆区这两条中国街道的商铺只是权宜之计。在天气比较好的日子或者其他一些日子，广州城的统治者，禁止“番鬼”成群结队地去郊区。一名旅行者，可能会瞅准机会，在上文提到的街道上满足他的好奇心，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他也可能宣称，他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人，带回来了真正的中国瓷器和扇子。事实上，这两条著名街道上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我可以发誓，如果在广州看不到更惊

① 萧一山编：《清代通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3 页。

② [法]伊凡：《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 1840 年代广州见闻录》，张小贵、杨向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27 页。

奇的东西，那么呆在停泊于江上的快艇中会更好些。我已经尽可能细致真实地描述了广州的欧洲馆区。它由10条孤立的街道组成，至多共住了200名红头发或黑头发的“番鬼”。^①

如前所述，道光时期的广州城不仅驻有总督、巡抚、知府等行政衙门，将军署、督标中军署等军事衙门，书院、学社、庙宇等文化设施，更有负责进出口贸易关税管理的海关署，另有集中的西关商业带、各类集市。可见，广州不仅是政治、军事和文化城市，还是兼有商业性质的城市，在当时的全国，这样的城市为数极少。^②当然还有外国人居住的特殊地区——十三行商馆。这使其功能布局纷繁复杂，也使广州的社会治安具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特征。

4. 城区人口及其社会生活

(1) 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根据光绪《广州府志》卷七十所记，自雍正九年（1731年）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番禺、南海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其中番禺丁数激增13倍之多。^③

嘉庆二十三年，南海县有人丁83万多，番禺县有人丁48万多，两者合计占当时广州府属总人口（340多万）的三分之一多，还不包括胥户、军户等。^④

通过对道光《南海县志》卷六和同治《番禺县志》卷三所记载的坊厢里甲的整理，清前期在老城内的坊厢（城中为坊，近城为厢）数约有21坊，但是坊厢内的里甲户数早已和明初“一里中有十甲，一甲中有十户”的状况大大不同，在县志中可以看到，有的甲只有一户，而有的甲却可多到上百户，因此通过里甲户数去计算城区人口数量肯定是不准确的。^⑤

到清代中后期，城区里的坊厢逐渐演变为街巷，是由保甲演化而来的基层社会组织，与街道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同治年间，老城内街95条，新城内街55条，城外街222条。其中南海县境的老城内街47条，新城内街31条，太平门外街134条，西门外街36条，大北门外街13条。番禺县境的老

① 《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第34—35页。

② 萧一山编：《清代通史》第一卷，第521页。

③ 《广州府志》卷十七。

④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二五。

⑤ 道光《南海县志》卷六，同治《番禺县志》卷三。

城内街 48 条，新城内街 24 条，东门外街 19 条，新城外街 20 条。“至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城）人口已接近百万”（不包括郊区棚户）这一数字是鸦片战争前夕访华使团成员的估计数字。^①

施坚雅专门对 19 世纪中国农业和城市人口的比例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各个地区城市群进行地区服务状况、发挥作用大小等的细致研究表明，1843 年岭南地区的城市化比率是 7%，城市化人口约为 204 万人。此外，每个地区的城市体系中都有一个主要城市，人口往往过分集中，并且意味着不是地区服务特别集中，就是主要城市起了一种超出它的地区腹地的作用。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州发挥的作用特别大，朝廷把帝国对外贸易的实际垄断权留给广州，并且指定该城市为几种重要进贡品的进口港。相对于该地区的城市体系，广州人口和集中程度相应过高。根据各地区城市中心地的等级——规模图分析，广州人口与岭南地区其他大城市的人口之比是 1.02 : 1，由此可以推算出 1843 年的广州城区（此处的城区范围应包括广州内外城、城周边街及河南）人口约为 103 万多人。^②

美国人魏斐德对 1840 年前后的广州城市社会形态印象深刻：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五十万人。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和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这里有六万七千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还有的工人则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在城

①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 2 卷，广州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277 页（另参见爱尼斯·安德逊《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费振东译，群言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8 页）。

② [美] 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 2000 年版。